

敦煌讲座书系

# 敦煌写本文献学



张涌泉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张涌泉 著

# 敦煌写本文献学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写本文献学 / 张涌泉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 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414-6

I. ①敦… II. ①张… III. ①敦煌学—文献—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0988号



出版人：唐西平

策 划：王光辉 薛英昭

责任编辑：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朱满良 杨 波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赵 鹏

敦煌写本文献学

张涌泉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49.25 插页 4 字数 660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423-2414-6 定价：98.00 元

#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凡 例

一、敦煌、吐鲁番地域相邻，敦煌文献资料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时代相近，语言上有许多共同性，敦煌学和吐鲁番学本身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故本书收采讨论范围包括吐鲁番文书。

二、文中所引敦煌文献资料，一般根据原卷（主要根据影印本、缩微胶卷或原卷照片），引例前标明卷号、书名及篇名。如 P.3418 号《王梵志诗·人间养男女》、北 8407（鸟 16）号《法苑珠林》、Φ.230 号玄应《一切经音义》等。引用吐鲁番文献篇题前注明考古编号，引例后括注所据文献册数及页码，如 64TAM4:37《唐总章三年（670）白怀洛举钱契》：“若延引不还，听牵取白家财及口分平为钱直，仍将口分蒲桃用作钱质。”（《唐吐》叁-224）指该件系 1964 年阿斯塔那 4 号墓出土文书，编号 37，文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叁册第 224 页。

三、引录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原卷缺字用“□”号表示，缺几字用几个“□”，不能确定者，上部残缺时用“□”号，中部残缺时用“□”号，下部残缺时用“□”号表示；缺字据异本或上下文或文意补出时在缺字符号后用圆括号注明；模糊不清无法录出或残存偏旁者用“⊗”号表示，缺几字用几个“⊗”号；如原卷本身有脱字，则

加“[□]”号表示之，脱字据上下文或文义补出时外加[ ]号；衍文用{ }括住。假借字、讹字在原字后用“( )”注出本字或正字。引例中的重文符号或省代符号一般回改为原字，有必要保留时一般用“=”形符号代替。释读尚存疑的，在字后或相应符号后加(?)。

文中引用前人整理过的敦煌文献，其中校录符号与上揭规定不同者，也一律依原卷实际情况改用上揭符号。

四、引文中除与所说明内容相关的俗字别体，以及为了不影响行文意义而酌情使用的繁体字外，其余均改作通行的简体字。但古本字（如弟与第，牙与芽，差与瘥，馱与厭）、古正字（如然与燃，般与搬）、古分用字（如算与筭，娘与孃，羸、龜与粗）及有特定目的的通用字（如数目字“升”作“昇”或“勝”、“斗”作“兜”、“石”作“碩”、“百”作“佰”或“陌”、“千”作“仟”或“阡”之类）一律照原卷录写。鉴于俗写“扌”旁与“木”旁、“巾”旁与“丩”旁、“衤”旁与“礻”旁以及“己”与“巳”“已”、“瓜”与“爪”、“曰”与“日”之类相混无别，引用时径据文意录定，不出注说明。

五、文中引用敦煌文献收藏编号，统一使用简称。见于卷子背面的文献简称“背”；凡各家著录标明为碎片者，简称“碎”。简称及对应全称如下：

S.——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M.A.Stein)编号

S.P——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木刻本斯坦因编号

P.——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Pelliot)编号

Д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编号

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编号

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原编号（引用时一般在序号后括注原千字文编号）

北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新编号

北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统编号

上博——《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编号

上图——《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编号

北大——《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编号

津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浙敦——《浙藏敦煌文献》编号

敦研——《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编号

甘博——《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敦博——《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西北师大——《甘肃藏敦煌文献》西北师范大学藏敦煌文献编号

石谷风——石谷风《魏晋隋唐残墨》编号

台图——《敦煌卷子》影印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中村——《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  
编号

羽——《敦煌秘笈》（大阪：日本武田科学振興財団，2009年—）  
影印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田亨编号

六、以下文献征引较多，文中亦或使用简称，相应简称、全称及其  
版别如下：

《宝藏》——《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

《英藏》——《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0—1995年

《法藏》——《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年

《俄藏》——《俄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2001年

《津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6—1997年

《浙藏》——《浙藏敦煌文献》，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甘藏》——《甘肃藏敦煌文献》，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国图》——《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

《台图》——《敦煌卷子》，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

《中村》——《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总括班2005年发行

《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刘铭恕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索引新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研究院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变文集》——《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唐录》——《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唐耕耦、陆宏基编，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5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郝录》——《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郝春文主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0年

《唐吐》——《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册，唐长孺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王一》——P.2011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王二》——故宫藏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玄应《音义》——《一切经音义》，唐释玄应，《丛书集成初编》本。该书另有《磧砂藏》本、《金藏》本、《高丽藏》本，引用后数本时在文中加以标注

慧琳《音义》——《一切经音义》，唐释慧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年影印日本狮谷白莲社刻本

可洪《音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五代释可洪，《中华大藏经》（第59、60册）影印《高丽藏》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说文》——《说文解字》，许慎，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清陈昌治刻本

七、以下整理文本引用较多，一般在引文后括注页码，不再一一出注说明。

《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敦煌歌辞总编》——任半塘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敦煌类书》——王三庆著，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郝录》）——郝春文主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0年

八、文中所附敦煌写本图版均根据影印本、缩微胶卷或原卷彩色照片，择优选用。图版依章编号，如第一章内的图依序为“图1-1、图1-2”等。所附图版多为原卷局部，根据需要截取，并酌情作显化处理，不再一一注明。

九、引用古今工具书和二十四史等常用古籍一般不标示页码；《大正藏》《卍续藏》等收录的佛教典籍，在有电子数据库的今天，查检殊非难事，引用时经核检纸本原书，亦不再标列页码，以免繁重。

# 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sup>\*</sup>

## (代前言)

公元1900年6月22日，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那一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数万件文献被王道士发现了。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文献的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4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敦煌文献发现一个多世纪来，经过无数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 一、敦煌文献的概况及其价值

敦煌文献总数近七万号，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579号，英国图书馆藏17000余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7000余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19870号。此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杭州灵隐寺、台北中央图书馆、香港艺术馆等机构以及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等国都有收藏。

---

<sup>\*</sup>本文为作者2008年8月16日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的学术演讲，后刊于《光明日报》2009年2月19日10—11版；收入本书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订。

敦煌文献主要为手写本，也有少部分为刻本，其中包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刻本（S.P2号）和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Дx.2880号）。敦煌文献的手写本最早为抄写于东晋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经》（甘博1号），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夫人氾氏添写报恩寺藏经录》（Φ.32号）<sup>①</sup>，前后跨越600年之久，历十多个朝代。据此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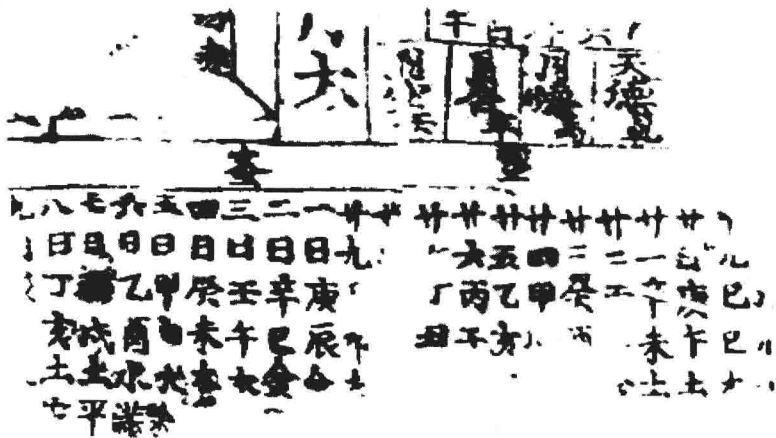


图 0-1 Д x .2880 唐大和八年《具注历》

<sup>①</sup> 这里所说“最早”“最晚”限于有明确题记纪年的写本；而敦煌文献大多为残卷断片，并无明确抄写年份，其中也许有早于或晚于上揭文献的写卷，如石谷风《魏晋隋唐残墨》第1号便是所谓“西晋写经残纸”，启功先生断为“西晋时写本”，但原卷所存仅区区五残行，不足十字，要据以判断其准确年代其实是不容易的。另外有些题记的可靠性还有疑问，如中村3号《法句譬喻经》写本末有“甘露元年”的题记，其中的“甘露”或以为是魏高贵乡公年号，“甘露元年”即公元256年（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第29、161、165页），但这个“甘露”是否确为魏高贵乡公年号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此件是否出于藏经洞也有不同说法）。又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有《道德经》残卷，未有“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統写已”的题记，但这个写卷的真实性是个疑问。又如P.4754号背为“壬寅年九月廿六日”龙兴寺藏经历，其中的人名雷（灵图寺）索法律亦见于P.3240号“壬寅年七月十六日付纸历”，这两个写本中的“壬寅年”亦可确定为宋咸平五年，日期或月份较Φ.32号写本的“七月十五日”稍晚。

因是什么，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敦煌文献使用的语言以汉文为主，又有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多是失传已久的民族古文字。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相当于唐代前后的一座图书馆，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保存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如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佛教佚典《佛说父母恩重经》，反映道教与佛教斗争的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参图 0-2），最早的词集《云谣集》，失传已久的古代讲唱文学作品“变文”，白话诗集《王梵志诗集》，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瑶池新咏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正名要录》，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星图》，等等，举不胜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的历史。更为可贵的是，传世古书大抵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的，而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图 0-2 P.2004 《老子化胡经》

此外，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或有这些古书的或多或少的引文，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原貌，解决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这里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国的“国”，繁体字本作“國”，简化字“国”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是学日本。这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字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字。我国从汉代开始就有近似的简化写法。敦煌写本 S.388 号《正名要录》载“國”俗字作“国”，是一个会意字（“口”中有“王”）。中国人写字的时候有个特点，喜欢给没有点的字加上一点，给没有撇的字加上一撇，“国”字的“口”里起初是一个“王”，后来被加上一点就是“玉”了，并且“玉”在古文字里原本也没有点，跟“王”字仅中间一横的上下位置略有不同。我们在敦煌文献里就发现了直接写作“国”的“國”字，说明这个字在中国至迟唐代就已经出现，日本的写法不过是沿用中国古代的俗字罢了。

## 二、敦煌文献整理之回顾

敦煌文献发现后，没有什么文化的王道士对眼前满满一洞窟卷子的价值茫然无知。尽管此后他到处寻觅知音，但还是未能引起国人的注意。直到 1909 年 9 月初，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携带部分卷子来到北京，京师的一批学者得以亲睹敦煌写本的真貌，才被强烈地震撼了。同月 25 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10 期，第 42—67 页），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同时，王仁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宣统元年〈1909〉九月，国粹堂石印本）；稍后，罗振玉辑印《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蒋斧辑《沙州文录》（亦收入《敦煌石室遗书》），是为敦煌文献校录刊布之始，从而正式揭开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序幕。从这些成果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程。

百年历程，弹指一挥间，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文献整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试以“文革”结束为界，分作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就国内敦煌文献校录刊布的情况作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 1. 第一阶段（1909—1976）

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布，是和伯希和的慷慨“馈赠”相关的。如上所说，伯希和 1909 年秋来到北京，惠允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于是便有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后来伯希和又陆续寄来一些法国所藏敦煌写本的照片，罗振玉据以编成《石室秘宝》（1910）、《佚籍丛残初编》（1911）、《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敦煌零拾》（1924）、《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4）、《敦煌石室碎金》（1925）等书，或影印照片，或发表录文，间或附有按语或校勘记，是为敦煌文献整理的第一批成果。这些书基本属于被动接受的结果，所收多为四部古籍，资料范围颇受限制。

同时或稍后，罗福葆辑录《沙州文录补》（上虞罗氏 1924 年刊印）、刘复辑录《敦煌掇琐》（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5）、许国霖辑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走的也都是文献辑录刊布的路子，不过所收文献已不局限于伯希和寄赠照片，其中《沙州文录补》共收敦煌文献 55 件，其中 13 件源自英国所藏；《敦煌掇琐》辑录敦煌文献 104 件，全都是作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亲自抄录而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写经题记 464 则，收录敦煌文献 99 种，则是作者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辑录而得<sup>①</sup>。这些辑本注重社会经济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收录范围大大增广。

<sup>①</sup> 1937 年 6 月，佛学书局印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对《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有所补充，辑录对象也不限于北平图书馆藏卷，而广及英法所藏。

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并因个人兴趣和治学侧重的不同，各有收获。1930年，胡适据法、英所藏敦煌写卷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这是敦煌专题文献汇辑校录之始。后来刘复编《十韵汇编》（北京大学1935），陈寅恪撰《秦妇吟校笺》（昆明自印本，1936），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1956年修订再版），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任二北撰《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姜亮夫编《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1955），饶宗颐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东南书局1956），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潘重规撰《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饶宗颐编《敦煌曲》（巴黎法国国立科研中心1971），也都是敦煌专题文献的汇录或校订之作。

1936年，《食货》第4卷第5期推出陶希圣编《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汇集在一起，是为社会经济文书的专辑。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敦煌资料》第1辑出版，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僧尼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文书原卷的录文，收采较前书更为广泛。

这一阶段，敦煌文献目录编制也有不少成果。1911年，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国粹学报》第7卷第1—8期），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同年，李翊灼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上海国粹学报社），这是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1931年，陈垣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敦煌劫馀录》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这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馆藏分类目录。后来又有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北平图书馆1936）、《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及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等一些敦



煌文献目录著作，特别是后者，系集大成之作，在写本的定名、断代方面多有贡献，为人们了解、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大便利。

## 2. 第二阶段（1977—2008）

第一阶段的六十多年，虽然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尤其是资料的刊布）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获取资料困难，加上长期的内乱和阶级斗争，使得我国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学界，以致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心。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于1957年得到一套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的缩微胶卷。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先后公布。1981至1986年，黄永武据缩微胶卷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稍后，《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在国内推出。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直接引领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向前推进。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举其要者，有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台北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7），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7）、《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至5辑（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项楚